



韩愈把自己活成了一条大河

王小柔

重磅
品荐

柳宗元在《读韩愈所著〈毛颖传〉后题》中评价韩愈的文章,说过一句很重的话:“韩子之辞,若壅大川焉。”意思是说,韩愈的文字像一条被堵塞的大河,憋着、蓄着,终有一天要决堤而出,漫过陆地。

《大河之诗:韩愈和他的时代》书名就取自这里,它开篇第一件事,就是拆偶像。北宋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言之凿凿:世人画的韩愈像,其实都是五代南唐韩熙载的像。那个清瘦儒雅、美髯飘飘的“韩文公”,是宋朝人集体想象的结果,真正的韩愈“肥而寡髯”,是个胖子,脸上只有几根稀稀拉拉的胡须。把胖的画成瘦的,再添一添漂亮胡子,画师们的心意不难猜:一个被苏轼誉为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人,怎么能长得像市井商贾?本书作者从这句考证写起,把那个被供了两百多年的偶像请下神坛,换上来一个“隐秘的摩羯座、垂青爱好者、李白杜甫的狂热崇拜者”,一个“有牙病,适度饮酒,极度不喜海鲜,爱议论,爱较真,喜欢赌一把”的活人。

条山苍 河水黄

韩愈三岁丧父,把他养大的是长兄韩会和嫂子郑氏。十岁那年,权倾一时的元载倒台,做起居舍人的长兄韩会受到牵连,贬官岭南,韩愈跟着一家老小迁居韶州。韩会英年早逝后,嫂子郑氏率百余口人的大家族扶柩北归归河阳,又举家避居宣城。

贞元二年(786)冬天,十九岁的韩愈从宣城出发,北上赴长安。他以为读书求仕是为了“为人”,等穷过之后才明白,更是“为己”。一大家子的衣食,都压在这个少年肩上。此后的长安十年,是韩愈人生里最不堪的一段。考进士考了四次,到贞元八年(792)二十五岁才中第,那一科主考是陆贽,同榜出了李绹、崔群、王涯等一千日后宰臣,人称“龙虎榜”。可是中了进士不等于有官做,还要过吏部博学宏词科这一关。他考了三次,全落榜。

这本书写韩愈,不回避他的寒酸、他的怨气、他的自嘲,甚至不回避他求人时“若俯首帖耳,摇尾而乞怜者,非我之志也”的倔强背后的狼狈。那个把自己比作大江中“怪物”的年轻人,得水则“变化风雨,上下于天不难也”,不得水则困死沟壑。这样的自画像,比任何官修传记里的“韩吏部”都更接近一个真实的天才。

我愿生两翅 捕逐出八荒

贞元八年(792)春天,一个面容忧戚的南方诗人走进韩愈的视野。此人姓孟名郊,来自湖州武康,四十六岁才第一次中进士,此前考了半辈子。长安的春风里,他躲在客栈里“一夕九起嗟,梦短不到家”。韩愈读他的诗,“食荠肠亦苦,强歌声无欢。出门即有碍,谁谓天地宽”,觉得那苦涩不止

于口舌之味,连肠子都感觉得到。他认定,这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那个人。

就此,铺开一整个中唐文人的“朋友圈”。孟郊、贾岛、张籍、李翱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元稹,还有董晋、裴度、武元衡这些朝堂重臣,韩愈这辈子认识的人、交过的朋友、得罪过的敌人,被一条时间线串了起来。读这本书,就像打开了一千多年前的“朋友圈”,哪年哪月在汴州,谁和谁喝了什么酒,谁给谁写了荐书,谁跟谁翻了脸,全都清清楚楚。

孟郊年近五十还未得官,韩愈在《醉留东野》里把自己比作小草,说愿意一生“低头拜东野”,如果孟郊是龙,他愿意变身为云,四方上下追逐他。作者认为,虽是酒后所作,粗粗莽莽,肆口道出,一种真意却喷薄于字里行间。真是把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去。

云横秦岭家何在

韩愈的一生,是沿着大河展开的。汴河、淮水、洞庭、湘水、沅水、湟水、北江,最后是八千里外的潮州。赵柏田抓住了这个意象:韩愈《复次赋》“凌大江之惊波兮,过洞庭之漫漫”。大河的飞沫,大河的气象,氤氲于他一生不断开拓的诗境之中。“他的一生也真如一条跌宕起伏的大河。”

贞元十九年(803),京畿大旱,任监察御史的韩愈上疏请求减免税租,得罪了京兆尹李实,被贬连州阳山令。那是他第一次被流放。荒僻的边城,山行有虎豹之忧,江上大石陡直如剑戟,县城里没有县丞和县尉,十多个小吏说话像鸟叫,韩愈初到时语言不通,只好在沙上写字与他们沟通。

永贞元年(805),他等来的是量移江陵的命令,不是赦还。中秋之夜,他和难友张署在郴州对月饮酒,写下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。诗里借张署之口,把贬谪岭南的艰辛写得“声酸辞且苦”:下床怕踩着蛇,吃饭防人下毒,海气湿蛰熏腥臊。张署一番悲歌唱罢,韩愈自己的声音升起来:“君歌且休听我歌,我歌今与君殊科。一年明月今宵多,人生由命非由他。有酒不饮奈明何。”

元和十四年(819)正月,宪宗迎佛骨入宫,长安举城若狂,百姓“焚顶烧指,百十为群,解衣散钱,自朝至暮”。韩愈上了一篇《谏迎佛骨表》,把佛骨称作“枯朽之骨,凶秽之余”,请求一把火烧掉,表中最触犯宪宗忌讳的,是韩愈历数前代奉佛帝王享国不长,并断言“事佛求福,乃更得祸”。宪宗盛怒之下要处死他,经裴度等人力谏,改为贬潮州刺史,且勒令即刻起程。

五十二岁的韩愈走到蓝田关,侄孙韩湘冒雪赶上。他还没从打击中缓过神,写下那首流传千古的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。书里写道,韩愈十岁那年随兄贬韶州,第一次经过蓝田关,十五六年前贬阳山,也是大雪天经过此地。此番第三次往岭南,衰年遭谴,再无归望,可以“云横”“雪拥”,心如死灰。而更惨痛的还在后面。韩愈离京五六日后,夫人卢氏带着百余口家眷也被迫离开长安。十二岁的女儿挈正在病中,



惊惶加上劳累,死于商州层峰驿,草草葬在道旁。

韩愈行至襄州宜城,听闻噩耗,已是许久之后。他一生写祭文无数,《祭十二郎文》痛彻肝肠,而《祭女挈子文》更见一个父亲的血泪:“昔汝疾极,值吾南逐。苍黄分散,使汝惊忧。我视汝颜,心知死隔。视汝我面,悲不能啼。”

天街小雨润如酥

韩愈在潮州待了约八个月。这八个月,是他人格最复杂的一页。

《潮州刺史谢上表》是韩愈到任后写给宪宗的例行公文,却倾尽了他的洪荒之力。他彻底认错:“狂妄愚蠢,不识礼度,上表陈佛骨事,言涉不敬,正名定罪,万死犹轻。”然后卖惨:“臣少多病,年才五十,发白齿落,理不久长”,“居蛮夷之地,与魍魅为群,苟非陛下哀而念之,谁肯为臣言者”?再捧宪宗“旋乾转坤,关机阖开,雷厉风行,日月所照”,建议皇帝东巡泰山、封禅告功,并自荐说,若遇大手笔,“编之乎《诗》《书》之策而无愧,措之乎天地之间而无亏”。

年初谏佛骨时有多决绝,此刻认罪就有多彻底。他胆怯了,他妥协了。这是一个妥协的年代,不妥协无以活。他希望妥协能够换来命运的改变。而这不过是绝境之下的一种生存方式。

读到这里,我忽然理解了这本书为什么叫“大河之诗”。大河不是一条直线,它要绕山、改道、回旋,甚至倒流,才能一路向前。把韩愈的“妥协”写进他的生命史,而不是替他遮羞,这需要一种近乎残忍的诚实。而诚实,正是这本书最珍贵的品格。

书的后半程,韩愈终于老了。元和十年(815),他在长安买了房,得意洋洋向儿子炫耀:“始我来京师,止携一束书。辛勤三十年,以有此屋庐。”从一捆书到一座宅院,他走了三十年。他的诗风也褪尽凌厉,写下了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”这样温润的句子。他的人生就像一支铆足了劲射出的箭,此时正以抛物线缓缓落下。

小柔
荐书

当她说“不”的时候 才是倾听的开始

王晨辉



《听妈妈的话》,李凡著,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。

“现在可以开始吗?”“没空,我要看这个。”这是李凡与76岁的母亲之间,一场关于“倾听”的对话的开端。女儿架好录音机,母亲却盯着电视屏幕,目不转睛。这一幕几乎构成了整本书的隐喻,你以为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,对方却用一扇关上的门告诉你:你来得太晚,我已经不想说了。

《听妈妈的话》一书源于简单的念头:“70后”女儿想给衰老而固执的母亲做一次口述。母亲76岁,腰膝手术后在体内打入一副钢架和十几颗钢钉,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却拒绝治疗。女儿想趁着还来得及,把母亲的一生记下来,但母亲的反应是冷淡的,“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?要不是为了帮你,我才不会说这些事。”

母女关系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纠缠的情感绳索。它绑得太紧,紧到令人窒息;却又太重要,重要到没有人能真正一刀两断。李凡的这本书之所以值得被认真对待,恰恰因为它没有提供和解的速效药,而是诚实地呈现了倾听的艰难,以及艰难之中,那些微小的、破碎的,却可能通往理解的光亮。

书中的母亲生于1943年的四川农村,在最贫瘠的土地上长大。贫穷到什么程度?家里连基本的红苕稀饭都吃不上,要靠吃野草充饥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一个女孩想要读书,意味着与整个家庭为敌。1958年考初中,母亲偷着跟亲戚借了二角五分钱的报名费,天没亮独自跑过二十多里坟地山路去赶考。考上之后,靠割草、捶鹅卵石凑学费。她拒绝所有提亲,说“要靠自己”,宁肯分出去单过也不嫁人。

这是一个关于反抗与突围的故事,母亲赢了命运的赌局,

长庆二年(822),五十五岁的韩愈奉命宣慰叛军盘踞的镇州。所有人都以为他回不来了,元稹说“韩愈可惜”。韩愈却对传诏的使者说:“止,君之仁;死,臣之义。”他单刀赴会,凭一番话折服了骄兵悍将,解了深州之围。书里写他“朗朗闻街鼓,晨起似朝时。翻翻走驿马,春尽是归期”,这个连归期都算好了的老头儿,还是去了。

长庆四年(824)夏,韩愈告病到城南庄休养,和学生张籍、贾岛在南溪划船。村里的孩子沿岸追着他们跑,田里的农人送他们西瓜,劝他们住下别回城。韩愈以欣快的语气告诉他们:“不回了。他写下《南溪始泛三首》,“榜舟南山下,上上不得返”“余年懔无儿,休日恰已晚”。黄庭坚独爱这组诗,“以为有诗人句律之深意”。

那年冬天,韩愈病逝于长安靖安坊,年五十七。临终前,他嘱咐家人,不许用佛道的仪式玷污他,要用儒家的礼法安葬,至死都不忘抨击他一生反对的东西。他对皇甫湜说,他怕的不是死,是“随世磨灭”。对遗忘的恐惧,大于对死亡的恐惧。

韩愈死后约十年,白居易在《思旧》诗里写了一句“退之服硫黄,一病讫不痊”,把一个至死排佛排道的老人,推到了服食丹药的道德困境里。一个毕生以道德律令立身的人,死后却因一句无妄之言,再次经受道德的责问,这真是命运开的玩笑。

但韩愈已经用一生证明了有些东西不可改变。书里有一段话,几乎是全书的心声:“对于韩愈和他的朋友们来说,道是至死也不能改变的东西。那是仁义,是友情,是对世界广博的爱,它同时也是头顶的星空,内心的律令,还有那些神祇的诗篇。”

书中引刘禹锡对韩愈的评价:“手持文柄,高视寰海。权衡低昂,瞻我所在。三十余年,声名塞天。”这个爱较真的胖子,这个会为两只白鸟鸣不平的穷书生,这个在蓝田关大雪里交代后事的老人,这个在病榻上还惦记着“游戏于斯文”的仙人,他的一生,真如一条大河,从模仿汉魏的莽莽苍苍,流经中年的险怪高峻,终归于哲学家式的平静。

《大河之诗:韩愈和他的时代》写的就是这条河。韩愈是一个不完美、会妥协、会害怕,却始终不肯熄灭内心之火的人。这比任何神像都更值得仰望。因为大河之所以是大河,不在于它从不改道,而在于它无论经过多少浅滩与风浪,始终奔涌向前,一路把泥沙、落花、星月与悲欢,都裹进自己的浪花里。

一本“大河”的航程与暗礁

书末的参考征引书目从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到钱仲联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》,字文所安《韩愈和孟郊的诗歌》数十种,引诗皆系年有据,考据功夫过硬。以“朋友圈”取代“单人传记”,让韩愈的命运嵌进中唐的时代网络,藩镇割据、党争、佛道之争、科举制度,都在人物的交游中自然浮现,读来不觉是历史课,却把历史讲透了。

但文学想象与史实的边界似乎又有些模糊。书中大量场景化叙述,如“他向着张公子笑了一下”“韩愈忽然悲从中来”等等,这些心理描写是作者依据诗文的合理推演,偶尔以“可能”“或许”标注,但更多时候,想象与史实水乳交融,普通读者难以分辨。对一部传记而言,这既是魅力,也是风险。作者对韩愈明显是“爱之者恒爱之”,写《潮州刺史谢上表》的妥协,他给了充分的同情;写白居易“退之服硫黄,一病讫不痊”的公案,他采信宋人“此退之乃卫中立”之说,为韩愈洗刷。立场可以理解,但学术界对此素有争议,书中未充分呈现相反证据,稍显偏袒。另外,大量引诗加白话翻译,对普通读者友好,但节奏偶显拖沓。

当然,这些都是“白璧微瑕”层面的挑剔。整体而言,这是一部真诚、有温度、有思想纵深的大众文史传记。

在历史的交汇点上重构文化自觉

颜小梅



《西潮东渐与文人心态——王韬的文化认同研究》,李子吟著,现代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。

19世纪中叶,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打破了“天朝上国”的传统天下观,当时的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体系。其中承受最深重精神痛苦的,莫过于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道统的知识分子阶层。这不仅是“器物”与“制度”的碰撞,更是“文化”与“信仰”的危机。传统士人如何在坚守本土文化主体性的同时,体认、接纳乃至吸纳异质文明?其内心的挣扎、游移、痛苦与抉择,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最为动人的精神景观。

《西潮东渐与文人心态——王韬的文化认同研究》一书,选择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典型人物王韬作为研究对象,将个体的生平阅历、文本书写与思想变迁,置于古今嬗变、中西冲突的复杂语境之中。作者打破了传统历史学研究或单纯文学传记的局限,以独特的理论视角和严谨的文献考证,细腻地勾勒出王韬在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、“中学”与“西学”之间的精神摆渡,为我们理解晚清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与文化认同建构提供了镜鉴。

全书以时间为轴,将王韬文化认同的演进划分为“形成”“转向”与“回归”三个阶段。作者首先聚焦于王韬思想的传统根基。在儒家文化环境的浸润下,王韬早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本土文化的主体性认同,并确立了“少为才子,壮为名士,晚年当为魁儒硕彦”的“理想自我”。然而,近代中国深层结构的变动与科举的失意,使得他的“政治事功”理想发生了严重错位。在这种身份焦虑之下,王韬转向了“艳史”书写以求建构自我认同,并在英国伦敦传道会创办的“墨海书馆”中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。这一阶段的王韬,对西方文明虽有器物维度的赞赏,但其内心依然受制于“天朝上国”和“华夷之辨”的主流话语规训。

1862年上书太平天国失败后,王韬流亡香港,随后更远赴欧洲漫游。香港的开埠体验和英、法政治的实地考察,显著动摇了他固有的狭隘“华夷观”。他亲历了